

中南民族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多民族社区公共娱乐活动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以湘西吉信镇天王庙庙会为观察中心

姓名：盛健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

指导教师：谭必友

2011

绪 论

一、本论文关注的问题及研究该问题的意义

笔者在民族地区进行的多次田野调查中发现，随着现代化的加剧，许多乡村地区已经实现了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办小学、村村建卫生站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中的新楼房层出不穷，同时新的家俱、家电、交通工具等也不断出现在乡村农民的家中。此外，在农村，许多劳动力，尤其是年轻人大都外出参加工作，而且工作地点大多是在离家很远的沿海地带，即使一些中年人，也经常在离家较近的大城市找一份临时性的工作。当今的农村，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一直呆在农村，外出参加工作的现象在当今是十分普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

与过去相比，当今的乡村社会中，现代化已经无孔不入了，而且人们的经济水平也大幅提高了，基本上已经摆脱了贫困，衣食无忧了，而且，伴随这人口的流动，人们也接触到了一些新事物、新观点，尤其是电视机的出现，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思维观念。以上的这些变化，也许农民自身还没有认识得很清楚，但不可否认，农村中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

基于以上的农村背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民族地区，尤其是一些多民族乡村社区中，民族之间的关系与以前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这个政治身份，在农民的思维中只是一个观念，偶尔毫不在意地被拿出来聊天，与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或所听到的民族自豪感相差甚远；在一些赶场中，各民族的人们往来其间，川流不息，与当今的市场经济下的大都市人一样，参加着日常的经济贸易活动；在一些政府组织的公共活动中，大家平等参加，虽然大家可能在服饰、语言上有些不同，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到活动的顺利开展和活动中人们的友好相处。看到这些，笔者觉得，社会发展到现在，一些地区，尤其是那些经济压力相对较小，或者说，经济收入已经不是主要问题的多民族乡村社区中，民族间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很和谐了呢？民族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究竟是怎样的呢？或者退一步说，民族界线是不是已经不被人们所重视了，逐渐被淡化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又淡化到哪种程度了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发展趋势的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决定选取一个角度，

来解开这些迷茫。于是，笔者选取了乡村多民族社区中的一个公共娱乐活动，来观察活动中的民族关系是怎样的，以期从该角度对上面的问题做个回答。

对该问题的研究，最直接的就是对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团结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把握好了民族关系的现状，对于社区内居民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社区稳定、生活幸福指数等，都有了很好的指导，对社区中的经济生活、乡风文明、政府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帮助，而且对于国家而言，也会为国家及时了解多民族社区中的现状，为及时调整民族政策，为国家管理社会生活提供很大的帮助。此外，通过对民族关系的研究，政府工作者也能从中发现一些规律，用来指导多民族社区的管理工作。

在当前的许多研究中，已经有许多学者运用民族学、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来调查各种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些理论规律加以推广。不过就本论文而言，笔者并没有打算将所调查的村庄、以及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作为整个多民族社区的特点来推广，但本文中所论述的民族关系现状在许多民族地区都已经出现了，这已经为许多学者在研究时所做的田野调查资料所证实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笔者敢肯定，本论文的研究所揭示的含义会远远超出调查村庄的范围。

二、该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及本论文的创新

本论文就“民族关系”、“公共娱乐活动”，以及“多民族社区”这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中国的民族学，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已建筑在丰富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¹，随着大批学者的加入，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到如今已经有相当丰厚的沉淀了。民族关系作为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也得到了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给与了关注。有对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朝代人们处理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进行分析，如郑炜²的《王安石民族关系思想初探》、崔明德³的《吐蕃民族关系思想初探——以吐蕃与唐朝关系为例》、于秀情⁴的《秦统一巴蜀前后与两地民族关系

¹ 谭必友，李臣玲：《中国民族学的学术渊源、整合历程与当代开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² 郑炜：《王安石民族关系思想初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³ 崔明德：《吐蕃民族关系思想初探——以吐蕃与唐朝关系为例》，《文史哲》，2009年第4期。

⁴ 于秀情：《秦统一巴蜀前后与两地民族关系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1期。

之比较研究》；也有对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进行探讨，这些探讨主要集中在全球化、网络信息、自然环境、宗教、人口流动、居住格局、旅游发展、经济利益、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交往心理等方面；有对构建当前的和谐民族关系献计献策，比如米多吉¹的《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阎耀军的《论我国民委系统民族关系预警机制的构建》²和《建立我国民族关系评估指标体系的总体构想》³，武汉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专题调研小组的《关于武汉市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调研报告》、王平⁴的《论武陵地区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机制的构建》等；也有学者对当前的民族关系进行的反思，如马戎⁵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等，也有对与民族关系相关的定义概念具体内容等进行学理上的探讨，比如赵健君⁶在文章《民族关系定义研究》、徐黎丽⁷的《再论民族关系含义》；还有些学者从功能的角度解读民族关系，如李红杰⁸的《试论民族关系的功能》、何生海⁹的《论民族关系的文化功能》等，还有一些学者，如吴德明、刘稚、廖小健等人，在研究国外的民族关系中，试图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来指导中国的民族关系研究，等等。

笔者觉得，以上对于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从宏观上给与探讨，关注的是民族关系的政策制定层面；从基层，尤其是从民族地区的农民着手研究，且站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的研究就比较少了。

相对于民族关系这个老话题而言，公共娱乐活动所受到的关注就要逊色许多。对于公共娱乐活动笔者发现很多方面还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很多问题都还没有达成共识，就一些关键词的探讨也在热烈地进行着。比如，在对公共娱乐活动的内容及分类的研究中，何为公共娱乐活动，公共娱乐活动该如何分

¹ 米多吉：《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

² 阎耀军：《论我国民委系统民族关系预警机制的构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³ 阎耀军，陈乐齐，朴永日：《建立我国民族关系评估指标体系的总体构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⁴ 王平：《论武陵地区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机制的构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⁵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⁶ 赵健君：《民族关系定义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4期。

⁷ 徐黎丽：《再论民族关系含义》，《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⁸ 李红杰：《试论民族关系的功能》，《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⁹ 何生海：《论民族关系的文化功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5期。

类，这是每个学者在开展该话题研究时必须理清的问题。对于公共娱乐活动的内容，大家都只有个感性的认识，比如具有大众参与性的歌舞、戏曲、乡村运动会等等、没有非常精确的定义加以概括。对于分类，有的学者如高霞玲¹把社会娱乐活动分为歌舞类、戏剧类、杂艺类、游戏类、竞技类等等，有些学者比如陈文敏²则把娱乐活动分为较低层次的消遣型娱乐和较高层次的审美型娱乐。不过，我觉得对于乡村公共娱乐活动的定义，只要抓住其公共性和娱乐性这两个基本的特点，再结合一些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就可以了。其实，由于中国乡村众多，各具特色，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要想从所有的现象中归纳出一个准确的定义是相当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乡村公共娱乐活动的空间场地也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伍先琼³把农民在闲暇时开展公共娱乐活动的场地分成广场、茶馆、农家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区域来加以研究，韩浩月⁴则站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从宏观上梳理乡村公共娱乐空间的变迁，认为“广场——大院——田间地头——礼堂——露天电影院——舞厅——录像厅——卡拉OK厅——酒吧——网吧——家庭客厅”是公共娱乐空间发展的脉络，刘扬⁵在研究寺庙文化时就指出，中国的寺庙因其独有的特色而成为公共娱乐活动的首选场地。

对于公共娱乐活动的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在对组织者的研究中，很多学者认为政府因其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因对乡村公共娱乐活动的开展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黄永军⁶认为当前湖南省小城镇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活动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大都与县(市)政府的重视程度、领导者的思想观念、体育局的人员配置等政府工作有关。也有些学者把目光转向了村民自组织的一些公共娱乐活动，对这些自组织的公共娱乐活动的运作、管理、以及发展给予了研究。其实，公司、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也逐渐参与到了活动中来，有的甚至担当了主要组织者的角色。对于参与者，关注最多的要数乡村妇女和青年农民了。很多学者就妇女参与到公共娱乐活动中的障碍和如何提高青年农民的公共娱乐活动参与性给与了探讨。

¹ 高霞玲：《近代湖南的社会娱乐研究（1911-1927）》，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² 陈文敏：《当下中国娱乐文化研究》，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³ 伍先琼：《从农民闲暇看农村公共空间变迁》，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⁴ 韩浩月：《娱乐场所变迁史》，《传承》，2009年第15期。

⁵ 刘扬：《近代东北民众日常生活与寺庙文化》，《文化学刊》，2009年第5期。

⁶ 黄永军：《湖南小城镇居民体育健身娱乐现状调查分析》，《湖湘论坛》，2006年第4期。

国外对乡村公共娱乐活动的研究中,英国的主要侧重于从乡村的礼庆娱乐和宗教节日娱乐来展开探讨,从而分析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休闲生活状况,日本则人为地构建了一个全国游戏日,并获得大人小孩的普遍欢迎。由于国情不同,笔者认为国外的一些研究很难在中国推广。

我国的公共娱乐活动,尤其是多民族相处社区中的公共娱乐活动,由于存在民族这一因素,在强调公共娱乐活动的公共性和娱乐性以外,就不可避免的要强调其公平性了,尤其是活动中参与者的角色和地位的公平。这一点在下面笔者对“公共娱乐活动”的定义中将会进行详细论述。

对于多民族社区的研究,也有许多学者给与了关注。学者谭必友¹在研究湘西苗疆时,考虑到当地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的互动十分复杂,很多乡村社区的成员,已经不能用当前的民族识别方法,很准确无误地判明其民族属性了。但又要想描述出多民族混居的这样一种局面,故使用了“多民族社区”这一概念,与此前学术界常用的“少数民族社区”、“民族社区”相区分。

其他学者的定义,如蒋连华²在《关于我国少数民族散居城市多民族社区建设的思考》中,认为“不同的区域内存在着一个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具有社区性质的小型社会。且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加剧,导致了这些小型社会中的民族成分日益复杂,少数民族人口不断膨胀,而这种小型社会又具有了构成社区基本要素的人口、地域、设施和制度。于是作者便把都市中的这种小型社会称作多民族社区。”马岳勇³在《城市多民族社区文化互动探析》中,认为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生活的民族,他们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交往,从而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多民族社区。对于多民族社区的研究,谭必友还在中南民族大学开设了“多民族社区研究专题”的硕士研究生课程,以方便更多的人能参与到该话题的研究中来。

本论文的创新。纵观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都是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民族关系,且大多数研究都是站在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的,对于具体事项中民族关系的关注还不够。要关注基层,把眼光“从下往上”看。本论文便是

¹ 谭必友:《清代湘西苗疆多民社区的近代重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页。

² 蒋连华:《关于我国少数民族散居城市多民族社区建设的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³ 马岳勇,李艳霞:《城市多民族社区文化互动探析——对新疆塔城市塔尔巴哈台社区的人类学调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从具体的活动事项出发，通过具体的活动来观察民族关系的互动情况，此外，在具体活动的选择上，笔者选择了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民族特色节日活动，而是选择了具有很强地域性、村民能平等参与的公共娱乐活动，作为观察的对象，这样，在以娱乐为主要目的、区域内各族群众平等参与的大型公共活动，来观察民族关系就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了。这也是本文可能的创新。

三、田野调查的经过及研究的理论、方法指导

支撑本论文的资料，大多来自于笔者的田野调查，笔者曾先后两次到过调查地——湘西凤凰县吉信镇开展调研活动。第一次是2009年暑假，当时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了一个关于村庄史的调查提纲，并选取了吉信镇下辖的一个民族村庄大桥村作为调查对象，在该村进行了为期20天左右的田野调查工作。调查时笔者发现该村庄在形成过程中，民族间的交往互动相当复杂，村民的姓氏、民族身份、进入村庄的时间大都不一样，这让笔者对民族间的交往互动，及村庄稳定格局的最终形成很感兴趣。第二次是2010年的暑假，由于在上次的调查中，得知当地农历六月初一在天王庙要举行庙会，于是笔者便提前几天赶到了吉信镇，并在当地的一个老乡家里安排下吃、住。庙会前笔者抓紧时间做了些准备工作，通过走访调查当地村民对天王爷传说的了解、对庙会活动的参与、对庙会活动中的各族的评价等。等到庙会那天，笔者还亲自参加了大桥村的天王庙庙会活动，近距离观察庙会中各族群众的表现，运用访谈法与活动参与者、管理者积极沟通。同时，还利用照相机、录音机记录一些图片和声音。庙会结束后，笔者还走访了一些群众进行调研，了解他们对庙会的看法。

本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现实的总结和思考归纳，而没有应用在许多笔者眼中视为经典的某些西方论断，因为笔者觉得西方的许多观点在中国找不到根基，那些论断很多从文化、从人性这些宏观上来把握倒有很大的可取之处，但范围如果一缩小，涉及到中国具体的民族，乃至来探讨中国，就显得有些牵强了。本论文在写作时，就以调研资料为重点，在此基础上来分析，涉及到的西方理论相对较少。不过，在研究中国的问题时，亦有许多学者从实际调研出发，扎根田野，认认真真地做研究，并立足中国的实际，总结归纳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所以，笔者在立足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从宏观上（如时代背景、国家环境）和微观上（如当代农民的特点）来分析，同时亦兼顾一些学者在民族学

本土化研究中的一些心得(如“多民族社区”方面的研究成果),来作为本论文的理论指导。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是采用田野调查法。通过各种途径深入田野,运用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以及对特定事物的“深描”,来获取详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四、关键词的说明

多民族社区——多民族社区,是相对于民族聚居区而言的。一方面,在历史上多民族社区内各民族间的交往互动频繁,形成的关系复杂,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严重。某一民族在与其它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不仅在不断改变着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它民族,这样就使得民族间的区分在某些方面越来越不明显,从而产生了一种民族边界在部分文化表现上较为模糊的现状,导致了人们几乎很难从传统文化或历史记忆中,非常清晰地理清自己的民族身份。但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或历史的记忆混乱,并不代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民族身份完全缺失,仍然有些特色鲜明的本民族文化特质,非常清晰地证明他们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居住格局及当前的行政划分,不同族别的群众生活在同一社区中,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产生了共同的社区认同,形成了多民族共居的行政社区。

湘西吉信镇正是这样的多民族社区。吉信镇辖 21 个行政村,有民族文化浓厚的苗族村寨,也有被现代化严重影响的散杂居村庄,同时还有些汉族聚居的村庄,涉及的民族主要有土家族、苗族、回族、汉族等。各民族间混杂而居,并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不断地交往互动,已具有了“我是吉信人”这样的社区认同观念,形成了现代的多民族社区。

公共娱乐活动——所谓公共娱乐活动,就是在一定的地域内,全民均能公平参与的,以娱乐为主的大型欢庆活动。地域性、参与的公平性、娱乐性是其主要的标志。结合当地实际,公共娱乐活动主要有由政府组织的春庆玩年活动、民间组织的每年阴历三月三、六月一、九月一在天王庙举行的庙会活动,以及社区内各单位间组织的文体活动。这些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并且是各族人民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能体现活动的公共性,这些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而那些民族的传统特色节日,比如苗族的“四月八”,土家族的“女儿会”,虽然有异族的参与,但本民族在其中是充当主体角色,异族在其中充当着可有可无的角色(观众),且这类活动主要是体现主体民族的特色文化,对主体民族而言,这

一活动可以算是该族的公共娱乐活动，但就该地域而言，就不能算该地域内各个民族群众的公共娱乐活动了。本文关注的是在一个多民族乡村社区中，各族人共同平等参与的、突出活动的公共性而非民族性的活动，且本文只关注庙会这一公共娱乐活动。

民族关系——本论文中的民族关系，只研究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研究民族内部的关系。关于民族关系定义，金炳镐认为：不同民族的人们以一般社会成员如工人、农民的身份发生关系时，不属于民族关系，不同民族的人们以民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交往和联系的关系，才属于民族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¹。这个观点我是很认同的，而且在下文中，尤其是在选取有代表性的观察对象时，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¹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

第一章 调查地简介

一、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吉信镇地处湘西凤凰县东北部，距县城 21.5 公里。湘西地处湖南西部边陲，古为五溪蛮地，先秦属楚，秦统一中国后，属黔中郡，汉为武陵郡，共领十三县，唐末五代之际，时统属溪州，且当时各族首领纷纷据地“自署刺史”，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局面。宋初，因袭唐在统一各边疆地区后，在少数民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设置羁縻府州的措施，由宋王朝敕封为刺史，称世袭“土官”，从此，湘西地区便在原来的州县基础上，建立了羁縻州。元王朝对少数民族采取招抚政策，按各族首领势力大小，依次设立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等机构，委以相应的官职，一般都称为“土司”。各土司由当地“蛮酋”担任，多为世袭，但一般不能自署，已成为朝廷命官。明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土司的控制，在各级土司机构中委派流官同土官共同治理，并进行监督。还在边沿险要地区设置卫所，驻守重兵，建立军事包围圈，实行封锁。明朝通过土司与卫所并存，流官与土官结合的这样一整套政治机构，残酷地统治当地各族人民。清初，沿袭明制“以夷治夷”，归顺的各地土司均先准其袭职。自康熙始，逐步采取轻土重流的政策以削弱土司制度。到雍正五年至十三年先后在湘西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实行流官统治。民国二十四年湘西设立行政督察区，不久将全县划为十个行政督察区，凤凰、乾城、永绥、泸溪等四县属第九行政督察区。¹

吉信镇所属地凤凰县于 1949 年正式解放，初属沅陵专区，1955 年划归湘西苗族自治州，1957 年 9 月 20 日改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直至今。2000 年，凤凰县辖 9 个镇、22 个乡，总人口近 35 万人，吉信为其中的一个镇，其人数为 1.2 万余人。2005 年进行了行政区划的调整，把凤凰县原直属的火炉坪乡和两头羊乡并入了吉信镇，火炉坪乡原来所辖的火炉坪村、塘寨村、追仁村、岩口村，以及两头羊乡原来所辖的拉斗羊村、茶山村、大塘村、高山村，全部划归吉信镇管辖，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吉信镇全镇总面积为 116.51 平方公里，辖 21 个行政村、1 个居委会，共有 4638 户、2.18 万人，是一个土家、苗、

¹ 熊晓辉，向东：《湘西历史与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 12 页。

汉、回等多个民族居住的地区。¹

就当地的民族分布而言，苗族聚居的村庄主要有三角坪村、火炉坪村、满家村、塘寨村、追仁村、岩口村、拉斗羊村、茶山村、大塘村、高山村等，土家族村庄主要是大桥村、都吾村等，其余则是一些各民族杂居的村庄，比如黎明村、油菜村、吉信村、联欢村、新田村、龙滚村、锡坪村等。²

就该地的自然环境而言，该地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冬暖夏凉，四季分明，春季多阴雨连绵，秋季前期常秋高气爽，后期多秋风秋雨。该地属于典型的山区，大大小小的山峰林立，狭长的村道弯弯曲曲。有山就有水，万溶江贯穿吉信镇，一年四季水流不断，209国道倚江而修，也从西向东通过吉信镇。该地不仅水源充足，而且森林茂盛，梯田满岗，属于山区农林业及经济作物类型地带。

在许多地区，尤其是一些生产力不发达的山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很常见的事情。湘西吉信镇也不例外，农民依据当地自然资源，开发出了一系列优势产业。该地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还是以种植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包谷，此外还有椪柑、板栗、猕猴桃、西瓜、玉米、棉花、江竹豆、茶叶、油桐茶、生漆、黄柏、杜仲、红晒烟等，近几年来，由于政府的引导及市场的需要，生姜普遍受到农民的欢迎，几乎家家都会种上一亩地的生姜，生姜已经在当地形成了产业化发展。当地养殖业也在农民经济收入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由于该地多山区，森林茂盛，水草兴旺，放牧方便，养牛养羊到处可见，尤其是饲养黄牛，笔者在走访中发现，许多农家都饲养，多则十几头，少则一两头。

至于贸易，当地俗称“赶场”，就是乡村集贸市场，每五天一场。交易的产品种类繁多，且绝大多数为农民自己生产的，农民把自家种植、养殖的产品运到集市，买卖双方进行简单的交易。而且当地的交通也比较方便，村村几乎都通有公路，交通工具则大多是方便在山区行驶的小货车和摩托车。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当地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加大了对该地的政策倾斜和物资投入，尤其是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该山区实现了通自来水、

¹ 此资料从镇政府的宣传资料中所得。

² 此资料为吉信镇的一位大学生村官提供。

通电、通路的“三通”，近年来，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当地开始实行农业产业化发展，同时，积极引进外资，开展民族旅游，刺激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农民也积极投身于这些经济活动中，村民们的经商意识逐渐浓厚起来，旅游业上，许多妇女就把自家的土特产带到当地的旅游区出售，年轻小伙子大多作为劳动力也参与了进来；农业上，当地开始培养自己的主导农产品，近几年生姜的种植，在当地已经是除水稻、小麦以外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建筑业也初具规模，许多农户联合起来，开办小型的水泥生产厂、砖瓦厂、石料厂，为村民提供建筑材料；运输业也不甘落后，虽然当地山高路险，但不管到哪个村，都可以看到小货车的影子，小货车已经成为农民运输的首选工具。

此外，一些现代产品也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该地，当地人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当地的传统社会面貌。在思维观念上，当地的人们也有了巨大的改变。由于是山区，许多农户家里都养殖了一些数目不大的家禽家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家禽家畜都很少放养了，都关在笼子或栅栏里，通过喂养一些饲料来助其增长，种植的一些农作物，比如小麦玉米，也用上了一些杀虫除草的化学药物，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这些装过药物的瓶子和塑料袋。

电视的进入，更是让他们对村外的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人们的思维观念发生了空前的巨变。早在 80 年代，这里就已经通电了，只是那时主要用于照明，近些年由于农民经济收入提高，许多家庭就增添了大量的高科技产品。走访中发现许多家庭都盖起了小洋楼，而且购买了高档的家具家电，现在几乎家家都有冰箱、电视机，经济实力好的家里还买了小型农用汽车。日子与以往相比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族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自给自足了，必须走出去，与更多的人建立各种关系，这样，各民族间的互动逐渐增多了，民族间的往来也频繁了。

二、当地民族关系史的流变

要研究该地的民族关系，首先要理清当地的民族成分。据史料记载，早在“五帝”时代，湘西土著先民便在这块土地上开荒拓土，繁衍生息¹。后来，随

¹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1955 年。

着民族的迁徙，许多民族都在湘西扎根，有自称“毕兹卡”的土家族、自称“白卡”的苗族，和被称为“帕卡”的汉族、被称为“民家人”的白族等，此外，侗族、瑶族等也在后来的民族交流与互动中来到了湘西。¹

对于当地的民族关系探讨，在许多史书或现在学者所写的著作中，研究主要集中在历朝历代的政府对当地的民族关系的治理上，从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上着手来处理民族关系。对乡村的基层社会中的各族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研究较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觉得可能是由于记录民间生活的史料不多，且其正确性又难以判定，加上民间生活交往复杂、且各个时段出现的族群身份又非常不便确定，这样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必须搜集、查阅大量的史料，且研究的又是相当繁琐的生活细节，研究的难度可见一斑了。

好在本论文关注的是当前状况，不必过多地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进行深究，不过，通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基本上是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的：湘西吉信镇是一个多民族的乡村社区。在历史上，当地人们的姓氏就能很直接地反映出他们的民族身份。史料《永绥直隶厅志》²中有如此记载：“苗姓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杨、施、彭、张、洪诸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地方志《乾州厅志》³中的《姓氏》篇中亦记载有：“乾苗止吴、龙、石、麻、廖五姓。其姓杨、施者，曰仡僚，乃民人入其巢，与之婚嫁，遂成其类者。今六里、永绥颇多此种。”当今的学者们在研究中也大多以姓氏来区分人们的民族身份，如熊晓辉⁴在其研究中指出：“湘西苗族主要聚居在沅水流域的凤凰、花垣、吉首……，杂居于龙山、永顺各地。其姓氏以吴、龙、廖、石、麻为主。”

当地的民族关系复杂，各个民族进入该地的时间不一，且交往互动频繁，历史上通过婚姻、经济交往、甚至战争等手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这里的民族融合。各民族虽然来源不一，但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湘西的各族劳动人民，逐渐在这里定居下来。在适应和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大家团结一心，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里，一起并肩作战，为建设美丽而富饶的家园，为追求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¹ 游俊，李汉林：《湖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² 《永绥直隶厅志》：清杨瑞珍纂，同治七年刻本，卷一，第473页。

³ 《乾州厅志》：清王伟纂修，乾隆四年本，卷之四，第387页。

⁴ 熊晓辉，向东著：《湘西历史与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湘西的历史是一部斗争血泪史。这里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过，自秦汉时期封建统治者在湖南设置郡县起，湘西各族人民就开始了反封建斗争，历朝历代总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斗争事件发生，后来帝国主义的入侵，给当地的劳动人民又加上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重任。从留下来的珍贵而稀少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反抗地主阶级、反抗封建社会，以及反抗外国侵略着的斗争中，当地的各族民众能暂时放弃民族间的隔阂，团结一致，为维护大家的生存发展而战斗。比如元朝统治后期，蒙、汉地主阶级对各族劳动人民压制、剥削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具尖锐化，各地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土家族、苗族人民也积极高举反元起义的大旗，如元末吴天保、杨留总¹等人，带领湖南境内的苗族、侗族、瑶族民众，率先揭开了全国大起义的序幕；明、清亦有不同规模的反抗活动，尤其是 1795 年开始的，反抗清朝政府的“乾嘉起义²”，更是表现出了当地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抗外敌的坚强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各族人民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民族的反抗斗争出现了胜利的曙光。1938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建立赤卫队，成立农民协会，实行土改，与地主、土匪以及蒋介石反动派展开了全面而彻底的斗争。在革命的年代了，湘西各族人民坚决地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为追求美好的幸福生活顽强地战斗着，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该地的民族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一种新型的民族关系正在逐渐形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该地各族间交往密切，民族间的关系和谐融洽，民族关系朝着“各族人民心连心，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大好局面发展着。吉信镇内的万溶江两岸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较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万溶江两岸民族关系开始好转。剿匪过程中，两岸苗、汉群众自发组成一个整体，积极配合解放军进山清缴；在土改中，这一带土家族、苗族、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成立农会，组织民兵，化解了许多积怨。如塘寨村有个水碾，原被地主霸占时不许放水，

¹ 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第 221 页。

² 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民委主编的《苗族史文集——纪念乾嘉起义一百九十周年》，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358 页。

附近苗、汉农民常为抗旱争水打架。土改中这水碾分给苗族的杨光春，1952年旱情严重时，杨光春让出水碾的水道放水，救活各族群众的50多亩稻禾。¹此外，由于当地属于山区，交通十分不便，于是政府便号召当地各族人民，参加修路修水库等劳动中来，在劳动过程中，各族人民互帮互助、共克难关，彼此间的信任不断加深，民族关系逐渐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极大地消除了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

湘西历来是苗族聚居区，为了苗族人民自己能当家作主，1952年8月，成立了地区级的湘西苗族自治区，后来根据我国第一部《宪法》的有关规定，湘西苗族自治区于1955年3月改为湘西苗族自治州。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进行及土家族被认定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之后，1957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了湘西苗族自治州，建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样一来，湘西的两个世居少数民族，从此走上了联合自治、共同发展的道路。²

随着国家法律的完善和政策的落实，对于人口较少的民族国家也赋予了自治的权利，一大批自治县、民族乡相继建立了起来，侗族、瑶族等民族也获得了管理本民族事务的平等权利。

改革开放后，由于交通发达，人口流动加剧，许多人走出了大山，同时，许多新事物也走进了深山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而且，与以往相比，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已有了大幅提高，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放了，这些都在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的民族关系。

三、公共娱乐活动——反映当前民族关系的重要窗口

改革开放之初，当地的社会格局还是保持着传统的样式，人们生活单调，九十年代的电影下乡，为农民的生活增添了一点活力，后来，随着农村通电工程的顺利完成，以及电视机的普及，人们大多都在家里看电视了，对公共活动已不再热心了，2000年后，旅游的兴起，带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的开发和保护，人们的民族文化意识逐渐浓厚起来，于是许多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就相继展开了。

¹ 李昌俊，彭继宽：《湖南民族关系史（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73页。

² 李昌俊，彭继宽：《湖南民族关系史（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5页。

在当前，观察民族关系的一个很好的窗口，要数公共娱乐活动了，它既有公共性，同时也具有区域性，都可以突破民族的界线。而且，娱乐活动属于精神层面，相对于物质而言，它所产生的资源竞争性要小得多¹，人们在精神活动中应该能更好的和谐相处才是。结合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并且结合笔者对公共娱乐活动的界定来看，当地的公共娱乐活动主要有单位企业间组织的文体活动、年会、庙会等。

单位间的文体活动也是公共娱乐活动中的一种。在吉信镇，不同单位、企业间，经常组织一些庆祝活动、歌舞晚会或篮球、羽毛球友谊赛等，来丰富大家的生活。在这些公共娱乐活动中，参与者的民族身份不同，活动的开展会增进彼此间的了解，这有利于培养健康和谐的民族关系。

年会，就是指庆祝春节的玩年活动，一般由吉信镇政府组织，每个村都派代表队参加。2009年的1月31日（即农历正月初六），吉信镇政府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共同构建和谐社会，隆重举行了“民族大融合，团结友谊贺新年”玩年活动。一时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满街都是苗族、土家族、汉族和回族群众。他们载歌载舞，吹拉弹奏，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表演的节目有花鼓表演、舞狮子、划龙船、苗歌对唱、武术表演和舞龙灯等，精彩的娱乐表演活动引起了现场近万名群众的热烈掌声。凤凰县的许多领导高度重视这一活动，亲自来会场观看并参与。此次活动全镇21个村和居委会以及镇直属单位都派员参加，可谓参与者众、活动面广、影响力大。

相比于年会的一年一次，庙会举办的次数就要多些了，而且也更具有地方特色。从学者对传统庙会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学者已经把庙会活动大致分为了祭祀活动、贸易活动和娱乐表演活动三个大的环节，且认为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大众性和开放性，活动为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另外，从对传统庙会研究中我们还能发现，庙会的各个环节也能很好地体现民族关系。祭祀活动中，历史上由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信仰对象，而庙会在大多数地方又是全村人共同参与举办的，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因此，庙会是民族性、宗教性和地域性融合的一个理想场所。庙会也能促进一定区域内的货物流动，各民族、各地区的人们可以借赶庙会之

¹ 黄彩文：《邦协村布朗族节庆活动中的民族关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机来进行简单的贸易活动，贸易活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庙会中的娱乐表演活动，由于它属于精神层面的事项，可以摆脱由于资源争夺而产生的经济纠纷，它更能反映实现小康生活后各族人民的民族观，娱乐活动中人们的表现也更能体现现代社会背景下各族间的民族关系。



图 1. 大桥村天王庙的庙会



图 2. 雅溪天王庙的庙会



图 3. 大桥村的年会

第二章 庙会中的祭祀和表演

一、当地历史最悠久的庙会——天王庙庙会

湘西吉信镇的天王爷传说由来已久，天王爷已是当地人心目中共有的一个地方神了，据一些学者考证，有人认为，天王庙也称三侯祠、三王庙，里面供奉的三位天王为三兄弟，他们出生后一个脸面为白色、一个为红色、一个为黑色，长大后他们一个个高大威猛、英勇善战，而且百战百胜。当时有苗民叛乱，于是当朝皇帝便派他们前去镇压。他们“统三十六人，杀苗九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皇帝很高兴，给他们封侯，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被朝廷杀害。为了纪念这三位民族英雄，当地人们便修建了许多天王庙，并相约在每年的阴历三月三、六月一、九月一祭拜他们，纪念他们的同时，也希望他们能保佑自己，为自己消灾祈福。还有学者认为，三位天王应该为古代巴人的祖先，白面天王应该是巴人的头领廪君的化身，相传廪君死后化作白虎，而红面天王和黑面天王，应该是出自赤黑两穴的其他巴人祖先的象征了，这样天王庙便成了巴人后裔拜祭祖先的地方了。

在一些史料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凤凰厅续志》¹的附录中有一篇题为《靖疆营重修天王神庙碑》的文章，文章中有一段关于天王爷的记载，摘录如下：“今天子御极五十有二年，余奉命驻扎竿城，既而以查边过乾。乾之阳有庙，且旧榜其上曰‘天王庙’。余不知其所由，进父老而问之。父老曰：神之庙，食于兹土者，四百有馀岁矣。有大庙在鸦溪，此其拜亭也。

所谓三王者，盖兄弟也。长曰金龙，次曰金彪，又次曰金纂，出于杨，为宋名将业八世孙。宋南渡，孝宗朝，奉命征讨辰蛮，拓九溪一十八洞。时苗与瑶合兵，皆一战击走之，追至奇梁洞，歼其渠魁何车，斩首九千馀级。蛮畏其威，民怀其德，遂立庙以祀之。其后灵爽在天，数显神异。宋朝嘉其忠义，赐以王爵，历元朝以至我朝，福善祸淫，悍患御灾，赫如也……余既作新其亭之庙，又从而为之记，盖欲以父老之所传闻，补史臣载笔之所不及云。

康熙五十四年岁次乙未季春中浣谷旦立。中宪大夫、分巡辰沅靖道、按察使司副使加二级周文元谨记述传，乾隆庚子榜眼。仪征江德量，林叟撰。”

¹ 《凤凰厅续志》，清侯晟、耿维中修，黄河清纂，光绪十八年刻本，第 672 页。

关于天王爷传说的起源问题，我们就不做详细的探讨了，但不管是哪种说法，有些文化因子是共同的，那就是天王庙里的三位天王是土家族的神，这一点也是当前许多学者考证研究后所认同的一致观点。人们在拜祭天王爷时，希望从他们这里获得某种保护，来安慰自己的心灵和寄托某种感情。在过去，人们十分重视对天王的崇拜，很多土家人还把天王爷请到了自己家的神龛上供奉着，在村庄外的空地上，经常看到一些村庄集资修建的小天王庙。在当前，还有一些土家族村庄，比如大桥村、都吾村，都还有天王庙存在着。而且在离吉信镇不远的雅溪，还修建了座大天王庙，里面装饰精美，气势宏大，香火不绝。而且，里面供奉的神仙，已经不仅仅只有天王爷了，还有如来佛、观音菩萨等等。笔者在访谈中，经常听到人们向我提起那个天王庙：“雅溪那里的天王爷好大哦”。在走访中还遇到一些雕刻师傅，他们告诉我，这些年还有许多地方在修庙，他们经常被请去雕刻一些牌匾碑文，而且要在庙宇的开光大典之前完工。

天王爷崇拜在当地人心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每逢庙会期间，四面八方的人们便相聚于庙中，烧香拜神、鸣放鞭炮、表演歌舞、共享斋饭等等，场面相当热闹。此外，在平时，比如适逢节庆、或者已故先人的忌日、或者还愿、或者有些事情要祈求天王爷，人们便会前往天王庙祭拜天王爷。

二、天王庙庙会活动中的民族交往互动

上文所述，传统的庙会研究，一般把庙会分为祭祀活动、贸易活动、娱乐表演活动三个环节。如乔南¹在研究山西庙会时就指出：庙会是集市的另一种形式，庙会除祭神娱乐外，另一种功能就是贸易。庙会中的贸易，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民族地区的人们，在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时，把自己生产的多余产品，带到人多的庙会中来进行交易，以换取一些生活中的必须品，比如盐、铁器、布料、种子，或者少量的货币等，这种现象发生在建国前后，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生产力低下的民族地区，相当普遍。还有一种庙会中的贸易，就是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借助庙会吸引来大量人口，然后许多商家便积极贩卖自己的特色商品，借以吸引游客，刺激其购买欲，如北京的城隍庙会、台湾的妈祖庙会等。然而在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地方，由于现代化的发展，市场的完善，已经摆脱了第一种状况，而又不足以达到第二种状况中的产业化贸易阶段，所

¹ 乔南：《浅析清代山西农村集市及庙会》，《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以贸易在当地庙会活动中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在当地的庙会中还是能看到一些小商贩的影子的，但非常少，笔者在参加一次庙会时，只见到了几个卖雪糕的，此外在没有其它的买卖了，很明显这一贸易活动不足以反映民族关系，由于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的市场经济比较发达，贸易非常方便，有了专门的集市，且离天王庙不是很远，在访谈的过程中，当地人告诉我在这里的庙会上已基本没有做买卖的，就连拜神所需的香蜡纸炮，也没有人来庙会中叫卖了。因此庙会的贸易功能在当地几乎不存在了，故本文在论述时也不研究其贸易活动了。

就吉信镇的庙会而言，吉信镇所辖共 21 个村，许多村都有自己的庙会。以大桥村为例，大桥村人数有 1600 左右，土家族占六成，且大多数都姓杨，其余的苗族、回族、汉族人数较少。大桥村有一古老的天王庙，其历史悠久，每年逢阴历三月三、六月一、九月一都会在此举办大型的庙会活动，临近各个村的村民都会带着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来到这里，与其他村民一起同台表演。大桥村的天王庙位于该村的北面，在那里有坐小山，小山的半山腰有块面积约 500 平米的平地，天王庙就坐落在那里。庙四周均有围墙环绕，该庙有东西两个庙门，正南面是一块高出地面一尺来高的戏台，戏台后的围墙已有很大面积的破损了，正北面就是天王庙了，庙坐北朝南而建，四大金刚分列左右，三位天王正坐于庙中，庙前香案、蒲团摆放完好，红幔垂挂，香炉生烟。庙中一棵大树，树干粗壮，一人合抱不住，斑驳的树皮见证着这座庙的古老历史。这里每逢庙会期间都有很多人前来祭拜，十分热闹，在平时，远近一些信众香客也会来此处求福还愿。农历 2010 年 6 月 1 日，在该地举行了简单但隆重的庙会，笔者有幸参加，并进行参与观察，下面是笔者在祭祀活动中所观察到和听到的内容。



图 4. 大桥村的天王庙外景



图 5. 大桥村的天王庙内景

（一）庙会中的祭祀活动

关于祭祀的原因和目的，许多学者都对之做过研究，认为祭祀是由于对世界的无知、或者是对神灵的敬畏、或者是对神灵的依赖、或是为了获取一份心灵的安慰等等，都有一定的道理。如蔡梅良¹就认为，祭祀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灾祈福报恩，以寻求一种心灵的“寄托与平衡”。直到文明程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仍然保留着这一传统，也许祭祀活动带给人们的远远不止这些吧。

2010年6月1日上午8点左右，笔者坐车沿209国道赶到大桥村，刚下车，不远处便看到两位中年妇女提着香纸，向村北而去，笔者断定她们应该是去赶庙会的，便赶上去和他们交谈起来。

访谈案例一：两位阿姨一位姓杨，一位姓吴，住在联欢村（该村与大桥村相邻），两位阿姨很健谈，我们便边走边聊，在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确实是去天王庙赶庙会，拜天王菩萨就平安的。其中杨阿姨告诉我，“每年的庙会，只要她在家，都会去参加，不仅去大桥村，别的村庄，只要听说有，而且时间又不冲突，自己一般都会去的，去拜拜那里的菩萨，求个幸福平安，虽然我不迷信，但多拜菩萨也没坏处的。”就这样，我们一路闲聊下来，大约10点钟，我们便到了庙门口。

庙里早已是热闹开了，断墙边，大树下，走廊里都站满了人。在主殿门口，一位年岁稍大的大叔（后来的交谈中得知他姓杨，土家族，50多岁了，是这座庙的管理者之一）支一张桌子，坐在庙门口，几个香客在他面前登记交款。香客在进殿烧香之前，都会给几块钱的香火钱，并和自己带来的香纸一并交给他，他接过钱和香纸后，便问香客们从哪里来、为何烧香、想求天王菩萨保佑你什么等等，并在登记本上一一记录下来，问完后便带着香客进殿祭拜，帮人燃香，并向神灵诉说香客的祈求。3、5分钟后，便帮香客把带来的纸投入到殿外的焚纸炉中焚烧，整个过程大概7、8分钟的样子，一个人如果忙不过来，旁边还有几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大叔，听口音应该是当地人，接替他做相同的事。

庙中除主殿中供奉着三位天王菩萨外，还有一偏殿，里面供奉着天王爷的母亲，香客们在主殿拜完三位天王爷后，还到偏殿祭拜天王母亲。祭拜的时候，

¹ 蔡梅良：《祭祀·社火·集市》，《求索》，2009年，第12期。

许多人口里练练有词，说些祈求保佑的话。

后来，在和管理这个天王庙的杨大叔访谈后得知，由于今天是庙会，他们在很早就要开始做准备工作了。除了打扫要比平时仔细外，还要准备一顿斋饭供香客享用，在带领别人拜祭天王爷之前，自己还要燃上大香、燃放鞭炮先行祭拜，之后才能帮其他香客燃香烧纸。

祭拜的过程简单但不失庄重，这从许多香客的表情、动作上可以看出来。许多香客在祭拜时小心翼翼，没有一丝的左顾右盼，动作缓慢，一丝不苟，仿佛庙里的肃静和天王菩萨的威严充斥着香客的内心，也许此时的香客正在向菩萨进行着最虔诚的祷告，把自己最真诚的心声吐露给天王爷吧。

从杨大叔的登记本上，我看到香客们拜神的目的。有祈求在外打工的孩子平安顺利的，有祈求病中的家人或自己快点康复的，有祈求家庭和睦，生活美满幸福的，有祈求早生贵子的……各种愿望都有，名目繁多，可谓有灾有病求消灾治病，没事也求菩萨保佑平安幸福。当然，除了祈求的，还有还愿的。

访谈案例二：在一棵大树下，我和一位姓吴的阿姨聊了起来，得知这位阿姨40岁左右，苗族，湘西凤凰县人。这几天在娘家避暑，娘家离这里很近，听说这里今天有庙会，便带着母亲和母亲的几个邻居一起过来祭拜了，祈求天王爷保佑自己家人幸福平安，丈夫生意兴隆，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在访谈中，当我问到“你知道天王爷是苗族的神还是土家族的神”时，吴阿姨的回答让我若有所思。她说：“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民族的，反正这个庙在这里很久了，从我出生时候就有了，我的祖辈也经常在这里来祭拜，他（这些神）肯定能保佑我们的。而且，我也经常参加庙会啊、寺庙开光庆典什么的，是神就都拜拜嘛，菩萨都会保佑的。我听说过几天吉信村对面山上的莲花庵也要搞活动的，我经常去，那面有很多佛的，有观音菩萨、有地藏王、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燃灯佛啊，到时候我也去里面拜拜的”。

12点整，一阵鞭炮声响起，杨大叔便开始招呼大家用斋饭了。斋饭后，在庙前破旧的戏台上，一些香客开始表演自编自导的节目了。此时杨大叔也有些许的空闲了，我便和他聊了起来。

访谈案例三：初步接触发现杨大叔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他跟我讲三位天王爷当年有多神勇，带领部下到处打胜仗，而且他还告诉我，“天王庙这一带有很多

个，鸦溪那里的天王庙最大，我们这样的庙是小的，可能只是当年天王爷的一个行营，当年在这里打过仗，当地人就建个庙纪念他们了。”当我问到来祭拜的香客都是哪些民族的时候，他告诉我，“这里的香客到处都有，土家苗族汉族都有的，不过还是苗家人多些，我们这里和苗家隔得近些，而且苗家比我们土家人还喜欢拜天王爷，他们人也多，我以前还不会说苗话，后来学，学会了。来祭拜的一些土家族人我一般都认识，那些苗家人来了，有的人穿着苗服，就是衣服上绣花边的那种，我一看就是苗家的，有些虽然不穿那花衣服，但是说苗话，我也能听懂的。”

当我问到“天王爷是土家族的神啊，怎么苗族也拜？”。杨大叔告诉我，来祭拜的很多香客都不知道天王爷是哪个族的，很多都是听说天王爷很神，打仗很厉害，能保佑我们，能消灾祈福，就拜了。什么民族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也不管那些，只要能保佑我们，只要能显灵，大家就都拜他了。

“您不介意他们苗族拜您土家族的神吧？”我笑着问到。“那不，天王爷保佑所有的香客，任何人都可以拜的，你也可以拜的，天王爷一样会保佑你的。”

午饭过后，仍然有些香客陆续前来，杨大叔也忙去了。我也忙着到处拍照去了，看着这三位天王爷，感觉他们已没有刚进庙时的威严了，一想到这些神灵都在暗中保护着我，此时已平添了几分亲近了。

（二）庙会中的娱乐表演活动

庙会中的娱乐表演，是由刚开始的宗教娱神发展到现今的娱人的，即使在乡间村野，哪怕只是图个热闹，节目依旧不缺。一些虔诚的信徒、香客，大家凑在一起，自己编些歌舞，来为庙会助兴。

众所周知，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歌舞，在一些民族地区，尤其是在传统节日上，那里可谓是歌的海洋，舞的世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大多都能歌一曲、舞一段。湘西吉信镇是一个多民族社区，这里以土家族、苗族居多，这里的人们热情奔放、积极乐观，且富有创造性，不论是在平时的生产劳作，还是在一些节日庆祝上，都能找到能歌善舞的好手，这里人们的生活是离不开歌舞的。

在6月1日的这天庙会中，由于天公不做美，下起了小雨，表演被迫取消，

我想观看表演的愿望也落空了，本来还想向杨大叔多问些娱乐表演的事，没想到斋饭后还有许多香客接连不断地前来祭拜，于是杨大叔忙上前迎接去了，并介绍了一位以前表演过节目的香客来和我聊。

访谈案例四：在和她闲聊的过程中，得知她也姓杨，是大桥村人，土家族，40多岁了，她告诉我，她经常外出表演节目，和她一同表演节目的演员很多都是该村的。以前村里有个锣鼓队，遇到公司开业，政府要搞接待活动，都会请她们去热闹下的，今天这里搞庙会，她们锣鼓队里也有几个香客，今天也都来了，可惜今天一早还在下雨，不然现在已经在表演节目了。

当我问到“以前的表演是如何安排的，谁组织，谁借的道具服装乐器？”时，这位杨阿姨告诉我，很多乐器是村民自己都有的，平时排练的时候就自己带过来练练。我们有很多人会拉二胡，打鼓的，排练的时候就叫他们带乐器过来。此时她旁边的一位阿姨告诉我“我们（香客）来一般就是来烧香拜佛，搞点活动玩耍了。演点歌曲舞蹈，就是这些了。我们这里都有人自己演了。都是我们这些爱拜菩萨的人自己演啊。而且那经常还要练，排的。哪有临时搞的哦，临时搞谁有那个本事，我们表演还要有本事的才能唱，不能乱唱的了。”

“是不是谁都可以演啊？不管他是土家族苗族汉族回族的吗？”我问到。“一般都是香客约好了排练，排好了就才来演的，而且这些香客很多都是周边村里的，大家熟悉，知道她有那个（把戏）演好的本事。”“哪个族的，我们这里有好多了，每个族都有的了，我们这里唱苗歌的多，也有唱党的政策好的，还有唱我们这里的戏曲的，很多节目的。”

以上是对演员的相关访谈，在访谈之初，笔者就有个大致提纲：对于表演活动，要从演员和观众的角度来分析，借此来反映其中的民族关系。演员的角度主要有表演节目的确定、编排，演员的配置、确定等，观众的角度主要是观众对表演节目的看法，对活动中他族的表现（包括演员和观众）的看法等。

访谈案例五：一群人在一起聊天，我采取了非结构性访谈。当我问到“以前庙会的节目好看不？大家喜欢看不？”时，有位大叔说“好看肯定比电视里的差些，但是里面有我一个邻居在表演，唱的也都是我们熟悉的歌，我们当然还是很喜欢的”。

“每次搞庙会都有很多人在看，大人小孩都很热闹的，平时都做农活，也

没什么好耍的，搞庙会就都来看表演、看戏，像我们这些老家伙就都会来看看的，有些老家伙还会拉琴打鼓的。很多人都来耍，周围村的人都来看，有时候一些苗家人还唱山歌呢。只要不下雨我们这里都有表演的，那些香客很喜欢搞这个活动。”

“这里的庙会以前还要热闹些的，以前人也多，那边的墙也是好的，墙前面的那个戏台还在的，那个戏台以前好大的哦，后来闹革命（指‘文革’时期）拆了，墙也塌了一方，唱不了大戏的。后来就修了那个小台子，买些水泥铺地，做了些水泥砖砌墙，搞活动就在那上面了。”“人也少了嘛，要不是那些香客要修，可能就没活动了哦”。

虽然不能亲眼看到庙会中的活动，但在和这些“老观众”的访谈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些过去的影子。笔者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了，民族成分、性别、年纪都已经不重要了，庙会给他们带来的除了祈求神灵保佑外，其他的就是齐聚一堂的欢声笑语了，也难怪，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那些勤劳、善良、朴实、憨厚的农民，除了平时的辛勤劳作，很少有这种大规模的娱乐活动了。更何况很多都是住在一起的熟人，大家能面对面地聚在一起唱歌看戏，有说有笑，其心情应该十分舒畅吧。

村民们对民族的认识仅停留在字眼上，压根就没有意识到民族背后的深层意义，不可能像许多学者那样做理性的分析，他们仅有一个肤浅的、感性的认识。庙会活动，这种在当地已经存在有几百年历史的公共娱乐活动，直至今天依然在当地人们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也许社会在发展中会使其丧失一些传统的部分，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事物不可能一成不变。在变化中旧的传统消失，新的亮点出现，只有不断地变化，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就如同当今人们对庙会的态度，对神灵的崇拜、对活动的参与都必须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相一致。那么，当今庙会中的民族关系在社会的发展中又变得怎么样了

呢？

第三章 庙会中所体现出的民族关系

一、民族宗教转化为社区宗教，民族文化社区化

民族宗教，它不像一些普世性宗教那样信众广泛，民族宗教一直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为本族人所信奉的，其信仰的对象、祭祀的方式等诸多事项都与本民族的历史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是一种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排他性的民族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与民族心理、文化、风俗习惯紧紧地融为一体了。¹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在部分民族社会中，宗教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²

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参加庙会的许多村民，不论是土家族、苗族、汉族，还是其它的一些民族，都会在天王爷面前烧香祭拜，祈求保佑。此外，还有一些信众，不仅祭拜本民族的神灵，还经常参加一些庙会活动，祭拜各路神仙，希望得到更多神的保护。

在庙会中，经常能看到一些穿着苗族花衣的人前来拜祭，而且很多都是朴实的乡民。在访谈中，当我问一些香客“你知道天王爷是土家族的神还是苗族的神”时，他们不仅热情地回答了我，而且还会和我聊一些其它的话题。从他们的回答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丰富的信息，比如上文提到的那位苗族的吴阿姨。

对于大桥村的庙会，香客们不仅祭拜主要的神，其他偏殿的神也都要拜拜的，虽然香客们进庙烧香主要是拜天王爷，但许多香客不会只给天王爷烧完香就完事了，还要拿着香到各个偏殿去烧香跪拜的，惟恐遗漏了某位大仙。对于其他地方的庙会，一些香客只要有空就参加的。笔者在调研中就遇到过，由于六月一在大桥村的天王庙有庙会，六月十八在莲花庵也要举办庙会，于是在大桥村的天王庙会中，就遇到香客相约 18 日一起去赶莲花庵的庙会。

在与一位大叔的交谈中，他告诉我“天王爷保佑所有的香客，任何人都可以拜的，你也可以拜的，天王爷一样会保佑你的。”后来笔者在莲花庵进行调查，与那里的一位师傅（也就是庵里的主持，大家都叫她“师傅”）访谈中，她告诉我，“这里的人拜神不管什么民族不民族的，大家来这里是求菩萨保佑的，菩萨保佑他们平安，保佑他们的病快点好，他们都会感谢菩萨的。”

在这些朴实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天王爷已经不再是土家族的代名词了，而成了大家共同的神，只要你信他，只要你拜他，他就会保佑你，这座地方神

¹ 宝贵贞：《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特点及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中国宗教》，2003 年第 8 期。

² 廖杨：《“民族-宗教问题”：概念、类型和实质》，《世界民族》，2010 年第 3 期。

已经突破了民族的界限，为更多的世人所接受和祭拜。

进一步观察，笔者发现，不仅信众在变化，庙里菩萨的设置也发生了改变。在湘西吉信镇调研时，许多人都跟我提到雅溪的天王庙，而且还很自豪的告诉我，“那里的天王爷可大哦”。笔者有幸前往调查，发现这个天王庙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建筑精美，香火旺盛。里面的菩萨，种类繁多。除了主殿中供奉有三位天王爷以外，还有许多偏殿亦供奉着许多神仙：天王母亲殿中供奉着的天王母亲，土地庙中供着的土地爷，天子殿中的天子、地母殿中的大地母亲、后宫中的娘娘、十王殿中的十大王爷（阎罗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包青天、卞城王、泰山王、秦广王、都市王、平等王、转轮王）、天军殿中的天军、东狱殿中的狱头等，神仙的种类繁多。除了天王庙举办庙会外，还有一个就是莲花庵，那里也在二月十八、六月十八、九月十八都会举办庙会。那里面供奉的菩萨也很多，有观音菩萨，有地藏王，消灾延寿药师父、阿弥陀佛、十八罗汉、西方三圣、燃灯佛。佛教的，道教的；地方性的，普世性的；东方的，西方的，各路汇集。



图 6. 天王庙偏殿之地母殿



图 7. 天王庙偏殿之东狱殿



图 8. 天王庙偏殿之土地祠



图 9. 天王庙偏殿之后宫



图 10. 天王庙偏殿之灵官殿

参加庙会的香客祈福的种类繁多。天王爷是地方保护神，很勇猛，能帮助人们消灾驱邪，这是当地人对他们的主要印象。求子，求学，发财，家庭幸福等等也成为了人们向天王爷祈求的主要内容，人们几乎把天王爷万能化了。

当地的许多香客虽然来自不同的民族，但都积极祭拜天王爷。只要时间允许，有些人还到别处去参加庙会，祈求各路神仙保佑。还有一些天王庙里面，除了供奉天王爷和他们的母亲以外，还供奉着其他的许多神灵，供香客祭拜。祭祀活动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无区别、无选择、但有目的的情形了，天王爷功能的泛化、信众祭拜的泛化、天王庙中神灵设置的泛化，使天王爷由民族信仰的对象上升到了社区里大家公共的神灵，民族文化以在交往互动中发生变迁，部分民族文化已外化成社区文化中大家都乐于接受的一部分了。

湘西的泛神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紧密相关。祁进玉¹在对三川土族“纳顿”节及多神信仰习俗进行人类学考察后认为，节日中对各种地方神的崇拜，其实恰恰是各个村庄之间进行文化交融的结果。扩大而言，这个观点也使用于民族。刘丽川²在研究客家的多神信仰时，就指出，客家供奉的各路神明，包括普适性的神、祖先的神灵、地方性的神明、乃至一些仙姑术士，凡能祈安、求福、修生养性的宗教及有保佑现世幸运、长寿、财富、平安、消灾解厄的民间诸神，客民不问神祇的性质如何，统统兼收并蓄，加以混合，融汇贯通于自己的信仰生活中。可见，实用的观点已经突破了民族的界线，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文化，社区内的民众都乐于接受。好的民族文化已不单单只是本民族所独有，社区内的其他民族也会主动吸收，为己所用。

多民族社区中民族意识淡化的同时，社区认同却不断地强化。对于民族身份的确定，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一直是民族认同的核心价值，宗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然而在吉信镇，信众的这种泛神信仰，已经使天王爷信仰成为社区内信众的共同精神寄托，成为地方社会所共有的神灵了。既然作为民族文化重要部分的民族宗教摆脱了民族的烙印，那么民族文化也走出了民族的范围，融入到了社区文化中了。

¹ 祁进玉：《仪式展演与象征意义：民间仪式中的多神信仰及其社会功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² 刘丽川：《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二、庙会中多元的民族特色并存

娱乐表演，历来是庙会活动中的一大传统，在过去，一些大户人家都会请戏班唱戏，来娱神娱己，热闹气氛。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地方还保留着这一传统。在湘西吉信镇，这一传统也没有完全丢弃，只是表演的内容更广泛了，唱歌跳舞这些现代娱乐形式在表演中所占的成分更多些。

庙会中的娱乐表演活动，是一个相当庞杂的事项，从活动的组织、策划、人员的安排、道具的置备，以及节目的商定与排练，甚至表演当天演员的发挥，现场观众的秩序维护等等，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到，虽然在农村中，活动的参与者没有很严格的要求，但这些流程还是不能少的。

表演的道具，大多数都是信众们自己带来的，这家的二胡、那家的锣鼓，在排练的时候也都会响起，走音了就自己调调，弦坏了就自己续上，没有什么过多的讲究。对于这些爱好吹拉弹唱的人们来说，手里的音乐器具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相当的熟悉和珍爱。

娱乐表演活动中表演节目的多元。传统的庙会以唱戏为主要表演活动，且节目内容多与娱神、祭祀有关，且很多节目都带有地方特色。在湘西吉信镇这个多民族社区中，当问道具体的节目内容时，访谈对象告诉我，说：“哪个族的都有，我们这里有好多了，每个族都有的了，我们这里唱苗歌的多，也有唱党的政策好的，还有唱我们这里的戏曲的，很多节目的。”“一些穿花衣的香客，有时候就在台上唱苗歌，我们听不懂，就看热闹。”

节目的编排上，倒有一点点要求，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我们的节目还要经常练，经常排的，哪有临时搞的哦，临时搞谁有那个本事，我们表演还要有本事的才能唱的，不能乱唱的，那样天王爷会怪罪的”。“一般都是香客约好了排练，排好了就才来演的，而且这些香客很多都是周边村里的，大家熟悉，知道她有那个（把戏）演好的本事。”

娱乐表演中，演员、观众的身份多元混杂。各族的观众聚在一起，彼此之间未出现一些排斥现象；节目也有很强的包容性，各族的都有，这些也在无形中拉近了民族之间的关系。

演员的民族成分多元。对于演员的加入，并没有严格的民族限制。一般只要是爱拜菩萨的，大家见面后都谈得来，而且还有点表演的能力，基本上都可

以去表演。“演员大多来自周边村里，很多都是一些香客人，以及一些香客的亲戚朋友，这些爱拜菩萨的人，每年在搞庙会的时候就搞点活动玩耍，我们大家就在一起热闹下的”。管理大桥村天王庙的一位谭阿姨用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

参与者的身份多元。庙会上人来人往，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在服饰上，虽然相似的现代化服饰很难让人们辨认出每个人的民族属性，但有些身穿花衣花裤、头戴银饰的老奶奶，让人一看便知是苗族的了。庙会当天，附近一工程队也来赶庙会，他们买了几挂大鞭炮来凑热闹，也想祈求天王爷保佑他们施工顺利。

大众对这种乡土气息浓重的表演，还是很欢迎的，在走访中，当我问到“庙会的节目好看不，大家喜欢看不”时，有位大叔说“跟电视里的一样，里面还有一个邻居在表演，唱的也都是我们熟悉的歌，我们当然还是很喜欢的”。“每次搞庙会都有很多人在看，大人小孩都很热闹的，平时都做农活，也没什么好耍的，搞庙会就都来看表演、看戏，像我们这些老家伙就都会来看看的，有些老家伙还会拉琴打鼓的。很多人都来耍，周围村的人都来看。只要不下雨我们这里都有表演的，那些香客很喜欢搞这个活动。”看来，虽然乡村里的文化娱乐活动相当匮乏，但不甘寂寞的农民还是有自己的娱乐方式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的。

活动的表演主要是以娱乐性为主，然而在乡间，由于条件的限制，乡民缺少完善的设备和专门的组织，同时也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营造欢乐的氛围，活动中的许多步骤大大地简化了，对道具、对演员、对节目的要求相当宽松，虽然天王爷是土家族的神灵，但在庙会活动中，对他族的参与没有任何限制，对其它民族文化也没有任何抵触，社区内大家平等参与，并以一种宽容，甚至欣赏态度，进入到这一“美美与共”的热闹场景中。

三、突破民族界线的开放性管理

对于宗教的管理，国内外都有很丰富的研究，然而对于民间信仰的管理问题却不多见，主要原因是因为民间信仰有太多的不稳定性和不正规性。“信仰杂

乱、无‘法’可依、管理缺失”是一些学者¹对民间信仰的归纳，对民间信仰的管理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在许多地区，民间信仰活动依然有序地开展着，而且时间上也很少间断过，这与民间信仰的自我管理是分不开的。

就大桥村的天王庙而言，名义上虽然归当地的宗教事务部管理，但他们却很少参与进来。在大桥村的天王庙里，常年住着一家人，女主人姓谭，土家族，40多岁，丈夫和几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剩下她和公婆三人。这家人在庙旁边修了一栋房子，平时就住在家里干点农活，接待着香客，也负责打扫和基本的维修。在举行庙会的那几天，大桥村里的几位长者就会前来帮忙，那位杨大叔就是其中之一，他帮忙收香火钱，帮香客上香，谭阿姨就负责烧火做饭，负责香客中午的斋饭，他们，已成为这庙会的实际管理者。

由于在乡间，没有过多的讲究，所以在调查之前我所设想的许多障碍，在调查时都没有碰到，从这个角度来看，乡间的民族隔阂倒真的淡化到看不见了，或者说基本上被人们所遗忘了。相反，为了沟通上的需要，民族融合的现象倒很常见。学说苗话就是其中之一。

从和谭阿姨的交谈中，我知道了，虽然天王庙是土家族的神，但前来祭拜的香客中，苗族人居多，而他们很多人都讲苗话，尤其是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于是，为了接待好他们，谭阿姨和杨大叔这两位庙里的实际管理者就学习说苗语，虽然这对于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他们告诉我，平时就经常和一些苗族亲戚、朋友一起聊天，请教一些苗话，后来说多了，也就记住了一些。慢慢地就能和那些上香的苗族人说几句话了。彼此也就逐渐熟悉了。

管理上的开放性还表现在，管理者对前来祭拜的香客没有过多的要求，在平时，庙门是不会锁的，尽管有家人住在里面，香客只要想进去烧香随时都可以的，不会有任何限制或阻拦。有趣的是，笔者前去调研的时候，谭阿姨家养的一条大灰狗很安静地躺在庙门口，谭阿姨告诉我，你只要不惹它，它就不会咬人的，那些香客都知道的，于是笔者怀着戒备的心理从不是很宽的庙门进去了，好在狗真的不咬人，笔者也就放宽了心，在庙里到处拍照。

¹ 曹赛娟：《加强民间信仰管理，引导服务新农村建设》，《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而且，就是在庙会中，也不会出现什么限制。“只要你烧香拜佛，天王爷就会保佑你的，我们也会给你登记，帮你向天王爷祈求，不会要求你什么。”谭阿姨说。

庙会作为一个民族互动的平台，作为各族民众感情交流的媒介，为各族间的交往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人们在这里来，主要是追求一种精神上诉求，就是因为这种共同的信仰，大家才走到了一起，增进了解，而且从未锁过的庙门，也向经过这里的每一位路人敞开着。

通过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我对庙会中的民族关系的总体印象是：人们普遍上对民族有一个很肤浅的认识，知道自己是什么族，且是在别人提示的情况下才有这个意识的，平时是没有主动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识的。对别人是什么族不是很清楚，更不感兴趣，对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很凌乱，很多也不准确，对于社区内的民族关系而言，更是模糊，普通民众的这种民族意识非常简单。民族这个词条在民众的头脑里虽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但具体是什么，他们也说不上来。平时日常生活交往中，邻里关系、亲属关系、地域关系（村属认同）似乎比民族关系更重要。当前的多民族社区中，民族关系出现这样的特点，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的。

第四章 影响当前多民族社区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因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原因，从宏观方面来讲，大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孕育这种现象的大背景。从微观方面来说，活动中的当事人和活动本身的定位，是造就这种局面的关键因素。在当前社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关系，是有其原因的。

一、现代化的大背景，导致了农民多元、开放、包容的思想观念

关于现代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是国内外许多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一大研究兴趣，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中国曾经提出过“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这里的现代化是落后国家追赶世界上先进国家的一种过程，是上升到国家层面来探讨的。就中国乡村社会而言，刚开始有些学者认为实现了工业化就是实现了现代化，也有学者加入了信息化的因素¹，后来学者们不断修正这些定义，并把文化的因素纳入到现代化的定义中，而且认为现代化具有整体性，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道德等各个层面，认为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核心并伴随着都市化、政治民主化和价值观念的理性化等。²更有学者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现代化其实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

3

从民族学的角度，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笔者觉得，在探讨现代化的时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观察，一是物质层面的变化，这包括衣食住行娱购等方面，一是从精神层面去分析，比如传统习俗、思维方式、个人习惯、地域文化、民族情感等方面。当然，这两个层面是密不可分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层面变了精神层面肯定会随着变化，同时思想决定行动，精神层面的变化肯定会影响物质层面。这也印证了一些学者所说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变化的过程。

¹ 孙来斌，薛金华：《世界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模式》，《湖湘论坛》，2010年第1期。

² 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张店镇个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³ 虞和平：《中国现代化进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在中国，尤其是在当前的时期，现代化这个大的社会背景，是探讨许多社会问题时所离不开的。对于现代化定义、特点、利弊等许多问题，许多学者也一直在研究。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互动是现代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既然现代化会产生文化互动，文化互动中两种或多种文化一旦接触，就会产生变化。

从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现代化对湘西吉信镇这个多民族社区的影响还是很容易观察到的。除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物质层面的变化以外，笔者觉得精神层面的变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更为重要。在乡村，对农民精神层面起到重要影响的主要是“看电视”和“外出打工”，这种现象已经为相当多的学者所重视，且已经有大量的调查研究予以证明了。在湘西吉信镇，农民在保持自己勤劳、善良、朴实、憨厚等传统的性格以外，由于接触到的信息、看到的各种社会现象多了，农民的眼界也开阔了，思维观念也开放了，对社会各种现象也采取了更包容的态度，当然，自己的想法也更多元化了。

当地的现代化表现，除了物质上，在文化生活上也有很明显的融合互动的。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互相学习语言和通婚。在调研中，笔者发现，人们在交往中很多人都会苗话和汉话（普通话），（由于土家族都讲普通话，在当地未发现人讲土家语），比如管理庙会的那位杨大叔，还有些演员，为了表演，也会学习苗话的，不仅方便表演，也方便与其他演员交流。而且，由于通婚的原因，有些家里有苗族人了，所以也学讲苗话。我调研时居住过的一户人家就是这样的，由于娶了个苗族媳妇，家里很多人就都会讲几句苗话的。

通婚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常见途径。在当地的调研中，通婚不仅是指当地人间的结婚，而更多的是与外地人间的联姻。在当地，很多适婚青年都外出打工，选择配偶时有选择本地人，也有选择外地的，不过后者情况比较普遍。打工地点一般多去沿海地区，在那边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这样，自己的配偶一旦回到吉信镇后，就要学当地语言，因为这是使自己尽快融入家庭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如此强大的现代化背景下，公共娱乐活动中人们的言行举止必然会受到影响了。不仅庙会会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在政府举办的春庆玩年活动中，篮球比赛、唱卡拉 OK 等这些以前从未有过的娱乐活动已经开始出现在农民的视野中，

活动中节目内容的多元、交往范围的拓展、对他族语言的学习、民族界线的淡化等现象，与现代化这个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二、农民活在当下、关注现实的生活态度，占据了主流

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天王爷应该是土家族的神灵，但在庙会活动中，不论是祭祀，还是表演活动，苗族信徒似乎还要多些。这就让人捉摸不透了。后来结合调查资料，仔细分析，发现民族观念在庙会中淡化了许多，他们关注的是谁能给他们消灾赐福，而不考虑这个神是不是我们族的神灵。对现实的渴求已经越过了民族的界线。

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乡村社会中的人们逐渐从“圣化的传统社会”走了出来，进入了一个“世俗的社会”里¹，人们对自然、对人和事，都有一种“世俗的”态度。受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影响，活在当下、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这些观念似乎不断在农民头脑中滋长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活在当下，关注现实的心理非常强烈。由于现代传媒的深入宣传和外出务工，农民接触到了现代社会的新观念，行为思想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以一种实效的观点作为评判万物的标准。以往那种认为民族地区人们把钱“吃在肉上，喝在酒上，花在鬼上”的现象，现在很难找到了。人们似乎都精明了起来，把以往的“传统陋习”都改掉了，办事只问便利不便利，不问是否合乎古老的章程；说话只求表情达意，不必一定合乎规矩。许多传统的教条被打破，关注现实，关注当前的生活状况似乎已经成为了当前农村地区人们的行为准则。

在庙会中，这种心理的强烈表现我们能很容易地感受到，祭祀中，在杨大叔的登记簿中，我看到了人们拜天王爷的各种愿望，求发财、求升官、求健康、求平安、求子、求家庭和睦等等，五花八门，天王爷已经成了人们表达自己各种祈求的对象，与那种英勇善战的原始形象相差甚远，天王爷已经被人们赋予了太多的意义，他们的功能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万能化。在调查中我发现，如前文所讲，许多信徒在拜神祈福时，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诉求对象，凡是前来的香客，不论求什么，都是先到天王爷前烧香祈祷，然后是到各个偏殿烧香，这不

¹ 姚蜀平：《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78页。

²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仅仅是因为庙会中佛像的多元，也不仅仅是人们对各路神仙的敬畏，而是如一位香客所说的“多拜菩萨也没有坏处”、“没灾没病的也来求个平安吧”。根本不管菩萨的民族身份。

不过这也难怪，在中国的文化里，儒释道几乎是很难分开的，许多道观、寺庙等宗教场所里，除了供奉本教的神以外，往往还把其他与本教不相干的神也供奉着，最明显的要数关二爷的金身了，有学者研究过，在中国的许多明鉴信仰中，关二爷出现的次数最多了，而且中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能与关二爷扯上关系。湘西吉信镇的天王庙中，大桥村的天王庙里面只供奉了三位天王爷和天王母亲，但雅溪的天王庙里面几乎各路神仙都有。在群众的眼中，也许没有那么明显的文化界线吧，更不要提民族界线了。

表演中也是，娱乐表演中，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对节目本身感兴趣，对于节目的民族定位并不关心。而且在农村，能举办这样的群众活动并不多，大家都只图个热闹，对于其中的民族因素，没有太多的意识。

在娱乐表演中，贫乏的乡村生活使农民感觉到很枯燥，于是庙会中的表演多少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欢声笑语，土家族、苗族、汉族，大家聚在一起，演员们吹拉弹唱，观众则鼓掌喝彩，台上台下闹成一团，再加上不时有香客前来祭拜，燃放鞭炮，更是点缀了欢快的气氛，里里外外一派和气。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天王爷信仰上，人们对神灵的敬畏感几乎不存在了，以往那种神、人的二元结构似乎已经被打破了，在神之上，还有更为人们所重视的、所在意的，那就是人们的祈求，对现世生活的不满与希望的祈求。神灵只是一个媒介，一个实现自己祈求的中间物。祭拜神灵时对现实生活的重视已经超出了对神灵的重视，世俗性战胜了神圣性，利益才是硬道理¹。娱乐表演也是，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乐在其中。

其实，农民都是很实际的，在大众化、世俗化的乡村里，民众要求并不高，²衣食住行，娱乐购物，健康平安……这些才是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能有就都很知足了。他们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去享受过高的精神追求的，那些“民族认

¹ 陈柏峰，郭俊霞：《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皖北李圩村调查》，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² 白南生：《农民的需求与新农村建设：凤阳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同、民族情感”等精神层面的诉求对于他们来说，目前是不现实的，民生问题永远是第一的。

三、多元的社会关系，无形中淡化了民族关系唯一性的地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走出了原来的生活场所，融入到了新的生活圈子，进入了一些新的领域，这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同时，也和外界建立了更多的关系网络。对于乡村中的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常用的一些是社会关系，主要有地域意识上建立起来的村寨关系、邻里关系，血缘姻缘基础上的亲戚关系、同姓宗族关系，甚至还有一些业缘关系、同学关系等等，这些人们逐渐建立、以及逐渐重视的各种关系，都是对民族关系的有力冲击。

多元社会关系的并存，从客观上来讲，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一元文化的主导地位，虽然人们并不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削弱主导文化。当然，这种多元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对以前的那种亲密的民族关系采取了面对面的、直接的、严肃认真的批评姿态，而是说它在客观上冷落了、打破了民族关系的一元格局，各种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出现，从而使得原来亲密的、一元的民族关系的“市场”与“地盘”大大缩小了，影响力也大大地降低了。多民族社区中的农民，他们有很多社会身份，在当前的社会中，阶层的身份定位（农民）似乎比民族身份的定位（某某民族）更能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民众很多时候是按照农民的身份，而不是民族的身份参与到日常生活中去。

多元社会关系的兴起，并不考虑对原来一元关系的批判。比如外出打工而建立起来的业缘关系，这种关系的出现，并没有要求人们放弃掉原来的民族关系，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原来的正统、对千百年来留下的传统进行有效的侵蚀和解构。当然，社会关系的多元，并没有导致民族关系的消失，国家、各级政府、以及一些乡村精英还在许多地方加强着“民族”这一身份话语，只是乡村中的大众没有给与回应罢了。

多元的社会关系，给当地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祁进玉¹在研究民

¹ 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族认同时指出，民族地区的人际关系逐渐由扁平化向立体化过渡，人们的交际范围不断扩展，社会身份多元并存。他在研究“家族观念与村属意识”时，谈到对别人身份的介绍，“他或她是某村人”比“他或她是谁家的谁”，前者更是突显了地域认同的观念。我在调查中也有这种现象，访谈时我发现，许多来参加庙会的人都是和同村的一起来，或者和亲戚一起，也有同姓家门的，却没有说是因为两人同一个民族的而应邀一起来的。尽管结伴而来的几个人中有些人是同一个民族。

活动的组织上也是的，在表演节目的安排上，几乎是“只要你有两下子，都可以上台表演的”，并没有排斥哪个民族的现象，而且很多节目还是（土家族、苗族、汉族）至少两个族以上的成员共同完成的，民族的界线在这里不是很明显。

四、地方政府的重视，为民族关系的融洽发展保驾护航

为实现民族和谐，党和政府一直在不懈努力，在革命年代里，国家就注意到了民族问题，并积极推行民族政策；建国后，又组织人员开展大规模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人们，保障区域内各族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后，许多基层单位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根据当地实际，在改善民族关系的工作上花了大量心血，开展了各种活动来密切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区域内的民族和谐发展。

在湘西吉信镇，吉信镇政府也积极相应国家号召，开展多元的民族活动来活跃民族氛围，融洽民族关系。除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理论上加强宣传外，他们还在日常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来关注民族事务。在年会、庙会、文化下乡等活动中，经常能看到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一些大型的公共娱乐活动，几乎都是政府发起和组织的，同时，一些民族特色的活动，以及一些节日庆典等，他们也经常参与指导工作。此外，他们还担负着维护公共基础设施的责任，2010年的暑假，笔者在吉信镇调研时，由于该地刚刚遭受了强烈降雨的影响，许多地方出现了山体滑坡，一些道路、桥梁、田地都被毁坏。吉信镇有一处莲花庵，地处一座山上，那里也常举办庙会活动，各民族也积极参加。笔者前去走访时发现，山前的道路却是新修的水泥路，庵外的围墙及小广场修葺一新。

后来在和里面的管理人员交谈后，才知这是政府在不久前拨两万元专款修建的。可见，当地政府的重视为民族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第五章 对当前多民族社区内建设 和谐民族关系的思考

稳妥地处理好民族问题，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一直是国家在民族事务，乃至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等各个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维护社会稳定、为改善民生，为保证人们生活安康做出了不懈努力。在当前社会，经过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良好的民族关系已逐渐形成，和谐的多民族社区已基本成为了现实。

一、多民族社区自身就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社区模式

前面已经提到过，多民族社区内的人们知道自己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但由于历史的变动和一些人为原因，导致他们不是很清楚个人的民族历史。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政治的影响，以及现代化导致人们观念的变化，多民族社区中人们的民族意识不强，对本族的历史记忆缺失严重，民族认同意识也普遍减弱。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学者谭必友¹从话语群的角度分析后，认为国家的民族话语介入改变了乡村地区的民族认同，民族归属在当地不是从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方面来确定的，而是人们从国家话语中看到了可以为自己获得一部分利益，而建立起来的权益话语。由于利益的驱使，人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发生了改变，原本一个民族成分相对单纯的村落格局，会变成一个多民族社区，只是社区内的多民族结构是虚拟的，同时，大量的多民族家庭也出现了。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观察便不难发现，这种局面如果长期存在，当地人就会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更迷茫。虽然在他们的身份证、户口本上把他们的民族身份界定得很清楚，但许多人的这种民族身份是建构的，是没有历史背景作为支撑的，而且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看到从根本上强化这一民族身份的自我意识和文化氛围，这就使民族意识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树，难以长存。

不过，在走访中笔者发现，当地还是有许多能代表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因子

¹ 谭必友：《古村社会变迁：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的，比如当地为了大力开发旅游产业，新建了许多具有民族风情的村寨和牌楼；乡间也偶尔能看到几位长者穿着颜色厚重的民族服饰在田地里劳作着，袖口、裤管处的花色滚边格外耀眼；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苗语，依然是目前当地苗族交流时使用的主要语言……这些，还是在时刻地提醒着我们这些外来的调研者，这里的民族还是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质的，民族间的区分还是很容易找到依据的。

对于其它的一些传统文化，他们的认识就明显模糊了。对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在调查中我发现他们基本上都知道自己现在是哪个民族的，这一点在不仅在身份证上写得很清楚，而且在与他们交流中也能感觉出来，但却不是很清楚这个民族身份对于在农村辛勤劳动的他们来说有哪些意义。民族认同的这种现状，也影响着当地的民族关系。在调查中，当问到一些民族文化，比如“天王爷是土家族还是苗族的神”时，就有农民不清楚了。在访谈中，笔者经常会问到，“你们知道天王爷是哪个族的神吗？”，许多访谈者的答案是“天王爷是我们这里的神，他能保佑我们的”、“是我们土家苗族的神”。由此可见，这种神已经不是一个民族的神了，而是一种地域意义上的神，民族界限的模糊，只能在地域上寻求认同了。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不得而知。

“天王爷为什么是你们族的神呢？”“他带领我们的祖先打仗，打仗很厉害的，拿刀杀坏人，保护老百姓”对于天王爷，许多人认为他们打仗很厉害，只知道他们作战勇敢，伸张正义，且神通广大。从这样的答案中已经看不到明确的民族因素，更难以体现民族情感了，实用的色彩倒很浓厚。可见，农民对于天王爷的认识已不会站在民族的角度来分析了。

多民族社区内人们对民族历史记忆的缺失、对当前民族身份的淡化与忽视，对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民族间的界线越来越不明显，大家的共性越来越多，交往起来障碍也就越来越少了。反过来，大家的共性越来越多，民族间的趋同性会不断增强，对民族特色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弱，这样就会使社区内人们在主观上淡化民族界线。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越来越多，这也要求人们扮演好各种环境下的社会身份，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这也就增进民族交流、密切民族关系。

作为多民族社区之一的吉信镇，基本上实现了一种“和而不同”的和平共

居模式。由于民族间的互动频繁，文化间的接触碰撞，发生文化借用与融合的现象日益增多，民族的边界在许多方面逐渐被打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在现实生活中亦很常见，各族对自己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在认识上都比较模糊，自身的核心价值十分弱¹。虽然有一些看得见的民族文化因子可以作为区分民族身份的标志，但在人们的主观意识里，这些特色也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人们依然在多民族社区的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各种角色。

二、和谐的民族关系已成为多民族社区的主流关系

民族关系，从宏观上来讲，笔者一直认为应该是属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分支，或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民族关系应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²，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文化的作用等因素，使它有了自己的特殊之处，再加上研究的角度是从“民族”出发的，因而民族关系的研究意义也就格外重要。在当前社会，由于现代化已经无孔不入，且深深影响了各族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许多多民族社区中，各族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基本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且随着交际面的逐渐扩展，各种社会关系也不断建立起来，人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生活方式也逐渐趋同，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和谐的民族关系，并不是要求什么都一样，民族之间可以有各自的特色，也可以有竞争。现代化建设对各族人们的生活影响固然重大，但现代化不可能，或者也不会这么快就实现人类文化的高度统一。在当前的多民族社区中，由于历史的因素，许多民族还是有自己特色鲜明的文化特质，只要这些存在，民族身份就不能抹去，也许这些文化特质并不为社区内各族人们所重视，但在许多习惯层面，仍然悄悄地决定着人们的言行。这些深层次的文化行为，也许就是民族特色的最后壁垒吧。

在当前的多民族社区中，民族关系和谐融洽，并已成为社区内的主流关系。当前社会，全国各族人们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人们在经济上已经实现了温饱，正大踏步地迈入小康时代。如今的一些多民族社区，人们的经济收入大幅提高，生活压力相对较小，在物质需求上已经能得到很好地满足了。庙会活

¹ 盛健：《多民族社区中“文化弱势民族”的发展途径》，《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年第2期。

² 王英：《论民族关系的本质及其奋斗目标》，《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动中的友好交流，公共娱乐活动中的欢聚一堂，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互助乃至相互通婚，都已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的民族关系已逐渐成为社区内的主流关系，渗透到了多民族社区的各个民族当中。

和谐的民族关系为和谐的多民族社区建设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和谐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当前的新时期里，我们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利用当前的有利局势继续解放思想，紧密团结各族人民，大力发展生产，使大家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结 语

在过去，民族关系一直是许多学者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国家各级政府在工作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前，许多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不发达，人们都被限制在土地上，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努力奋斗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多，彼此了解也不够深入，民族间的隔阂、误会长期存在，民族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都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中，人口的流动、现代化的影响，打破了各种障碍，各族之间的了解、互动不断增多，民族关系逐渐融洽起来。在当前社会的多民族社区中，也在发生着类似的变化，社区内各族人们不断解放思想，艰苦奋斗，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逐渐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营造多民族友好相处的社区氛围。

湘西吉信镇就是当前多民族乡村社区中的一个例子，该地的民族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由民族隔阂到民族融合的过程，直至形成今天的民族关系和谐融洽的局面。从社区内举办的一些公共娱乐活动中，我们发现各族人同聚一堂的现象很常见，彼此之间相处也很友好，当地政府也为密切民族关系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这让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民族关系也在向更好的方向转变，各民族间友好往来、和谐相处的现象不断出现，安定团结的民族关系已经深入到了多民族社区的各个方面。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美美与共”的民族关系必将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一、期刊类（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 1、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1955年。
- 2、李红杰：《试论民族关系的功能》，《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 3、吴善中：《湘军与哥老会》，《江海学刊》，1997年第5期。
- 4、徐黎丽：《再论民族关系含义》，《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 5、于秀情：《秦统一巴蜀前后与两地民族关系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1期。
- 6、刘丽川：《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 7、宝贵贞：《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特点及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中国宗教》，2003年第8期。
- 8、谭必友，李臣玲：《中国民族学的学术渊源、整合历程与当代开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 9、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 10、黄永军：《湖南小城镇居民体育健身娱乐现状调查分析》，《湖湘论坛》，2006年第4期。
- 11、赵健君：《民族关系定义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4期。
- 12、王平：《论武陵地区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机制的构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 13、曹赛娟：《加强民间信仰管理，引导服务新农村建设》，《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 14、祁进玉：《仪式展演与象征意义：民间仪式中的多神信仰及其社会功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 15、何生海：《论民族关系的文化功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5期。
- 16、黄彩文：《邦协村布朗族节庆活动中的民族关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 17、金炳镐，严庆，杨成：《民族关系构成方式——民族关系理论研究之一》，《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2期。

18、金炳镐，陈丽明：《民族关系本质特征——民族关系理论研究之三》，《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3期。

19、乔南：《浅析清代山西农村集市及庙会》，《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0、岳谦厚，郝正春：《传统庙会与乡民休闲——以明清以来山西庙会为中心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1、阎耀军，陈乐齐，朴永日：《建立我国民族关系评估指标体系的总体构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2、崔明德：《吐蕃民族关系思想初探——以吐蕃与唐朝关系为例》，《文史哲》，2009年第4期。

23、马岳勇，李艳霞：《城市多民族社区文化互动探析——对新疆塔尔巴哈台社区的人类学调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4、郑炜：《王安石民族关系思想初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5、刘扬：《近代东北民众日常生活与寺庙文化》，《文化学刊》，2009年第5期。

26、阎耀军，张美莲，王樱：《论我国民委系统民族关系预警机制的构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7、米多吉：《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

28、蔡梅良：《祭祀·社火·集市》，《求索》，2009年第12期。

29、韩浩月：《娱乐场所变迁史》，《传承》，2009年第15期。

30、蒋连华：《关于我国少数民族散居城市多民族社区建设的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31、孙来斌，薛金华：《世界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模式》，《湖湘论坛》，2010年第1期。

32、廖杨：《“民族-宗教问题”：概念、类型和实质》，《世界民族》，2010年第3期。

33、王英：《论民族关系的本质及其奋斗目标》，《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34、盛健：《多民族社区中“文化弱势民族”的发展途径》，《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年第2期。

二、学位论文类

- 1、刘思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民族关系及其发展》，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 2、高霞玲：《近代湖南的社会娱乐研究（1911-1927）》，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 3、陈文敏：《当下中国娱乐文化研究》，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 4、伍先琼：《从农民闲暇看农村公共空间变迁》，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三、著作类（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

- 1、《乾州厅志》：清王玮纂修，乾隆四年本，卷之四。
- 2、《永绥直隶厅志》：清杨瑞珍纂，同治七年刻本，卷一。
- 3、《凤凰厅续志》，清侯晟、耿维中修，黄河清纂，光绪十八年刻本。
- 4、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民委主编的《苗族史文集——纪念乾嘉起义一百九十年》，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
- 5、姚蜀平：《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 6、熊志冲：《娱乐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 7、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1年。
- 8、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 9、虞和平：《中国现代化进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 10、游俊，李汉林：《湖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 11、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
- 1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3、吕大吉：《宗教学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 14、凌纯声，芮逸夫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北京：民族出版，2003年。
- 15、[英] 约翰·塔洛克著：《电视受众研究：文化理论与方法》，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 16、谭必友：《古村社会变迁：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年。
- 17、[美] 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18、李昌俊，彭继宽：《湖南民族关系史（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
- 19、陶东风，和磊：《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 20、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
- 21、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一张店镇个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
- 22、李春霞：《电视与彝民生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年。
- 23、谭必友：《清代湘西苗疆多民社区的近代重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
- 24、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年。
- 25、熊晓辉，向东：《湘西历史与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
- 26、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 27、陈柏峰，郭俊霞：《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皖北李圩村调查》，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28、白南生：《农民的需求与新农村建设：凤阳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

致 谢

时光匆匆，三年的读研生活即将划上句号，虽然要求自己每天坚持看书学习，然则民族学专业知识广博、涉猎庞杂，且人才辈出、高论日新，自己还是深感知识匮乏，学业不精。不过，这几年的民族学专业知识的学习，使我眼界大开，终生受用。

很庆幸能在中南民大认识几位名师，并能得到段超教授、柏贵喜教授、李吉和教授、谭必友教授亲自授课，受益非浅，尤其是要感谢导师谭必友教授三年来对我在学习上和生活中的指点和关心，同时，也很高兴能和几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俊杰成为同学，一起学习生活，很怀念大家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感谢家人对我的付出，父母对我无私的关爱和默默的支持是我坚持学习的动力。感谢中南民族大学，感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老师们三年来对我的培养，也感谢图书馆的各位老师给我提供的帮助。

这篇论文能最终写成，除了有我导师的辛勤指点以外，还有调查对象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了，感谢吉信镇满家村五组吴大叔家对我的照顾、感谢吉信镇大桥村七组杨爷爷的接待、感谢小向导老幺……向你们致以真诚的感谢和问候。

最后，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评审我的论文，学生自知能力有限，提交的论文中还存在问题，敬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盛 健

2011年5月22日于中南民大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盛健：《多民族社区中“文化弱势民族”的发展途径》，《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 年 02 期。